

广州文史第五十九辑

回忆广州儿童剧团

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荔湾区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合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文史第五十九辑

回忆广州儿童剧团

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荔湾区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合编

主编 李齐念
副主编 彭颂涛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忆广州儿童剧团·广州文史第五十九辑/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荔湾区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4

ISBN 7-218-03925-1

I. 回… II. 广… III. ①文史资料—广州②儿童剧—剧团—史料—广州市—现代 IV. K2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7519 号

责任编辑	谭天河 刘育青 游建芬
封面设计	彭颂涛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发行
印 刷	广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35,000 字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3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3925-1/K·820
定 价	1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读者,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题诗	杨应彬	(1)
难忘的一百天	郑黎亚	(2)
广州儿童剧团战斗历程	叶 华	(6)
怀念海风同志	白 桦	(23)
忆团长谈星的教导	路 瑶	(29)
我们的指导员——郑黎亚	杨永洪	(39)
革命斗争中的一颗闪耀的星		
——怀念谈星同志	周 英	(44)
难忘的广州儿童剧团诞生六周年纪念活动日	张 平	(49)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陆艾明	(52)
记谈星团长对我的一次教诲	叶 里	(54)
我们永远怀念的团长	徐 力	(57)
谈大哥教我们学游泳	叶 华	(59)
广州儿童剧团在桂平		
——回忆我们的团体生活	谭 艺	(62)
抗日战争中的广州儿童剧团	杨永洪	(68)
回忆我在儿童剧团	宁 燕	(72)
回忆广州儿童剧团的舞蹈活动	杨 红	(80)
记广州儿童剧团美术组的活动	杨 红	(84)
“团徽”的故事	杨 红	(89)
记团刊《南海潮汐》	黄润业	(93)
童年的歌声	乔 飞	(95)
我的回忆	徐芷茵	(97)
忆横县至永淳难忘的一夜	林维真	(99)

特殊的舞台	叶 里	(102)
回忆在“基庐”和“均平”	林维真	(108)
押往南雄途中	徐 力	(110)
“感化”学习班	林维真	(112)
集体绝食	林维真	(114)
我们包揽了第一名	李柏松	(118)
广州儿童剧团往事琐记	丁 文	(122)
剧团在肇庆	方 凌	(126)
我当上了小先生	覃 莹	(128)
钱的故事	杨 红	(130)
亲情	杨永洪	(133)
忆往事	白 萍	(138)
英雄出少年	黄义祥	(143)
我们爱着团体如同母亲	杨永洪	(147)
忆广州儿童剧团	吕 复	(152)
美好的回忆		
——记谱写《广州儿童剧团团歌》的经过	陈 柏	(155)
一百三十里步行记	徐芷茵	(158)
儿童剧团的战斗精神	张 玲	(160)
我与广州儿童剧团	黄惠贞	(161)
缅怀过去	谭鹤龄	(164)
广州儿童剧团的精神	张 平	(166)

曾经烽火战仇雠，稚气孩童已白头。

今日长征新路上，同挥彩笔写神州。

杨应彬

(原广东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

难忘的一百天

编者按：广州市儿童剧团指导员郑黎亚，参加了剧团成立 63 周年活动。她认为荔湾区收集儿童剧团史料，让团史面貌更真实，更完整地保存下来，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大事。当大家尊称她为指导员时，她深情地再三强调：与其说是我去指导孩子们，不如说我受到了儿童剧团的教育并深受感动。当年广州儿童剧团在柳州期间，她受地下党委托担任指导员，与孩子共同生活、学习、工作了 3 个月，是她 60 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最独特的经历。她认为当年全国上下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抗日救亡的文艺组织也有不少，但以儿童为主的并不多见，像广州儿童剧团上过前线，下过监狱，饱受磨难的更是绝无仅有。她很有感慨地说：“在撰写广州地方志时，我坚持要把儿童剧团写进去，十一二岁的孩子为了抗日，为了救国而上前线、坐牢，这一段历史绝不该让它湮没。”

下面是郑黎亚同志的回忆。

抗战初期，我在中共特别支部领导下的战地服务队，在武汉外围搞战地工作。1939 年到韶关后曾被分配到惠阳游击干部训练班以及韶关游击干部训练班搞政治思想工作。1940 年春当我和杨应彬、朱河康、吉联抗等同志从韶关到达柳州时，我们的战

时工作队早已到宾阳、上林前线去工作了。我本来想马上赶到队里去，谁知第二天特支的领导人左洪涛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到广州儿童剧团去工作。他说广州儿童剧团是个进步团体，刚从桂林到柳州。据了解，那里政治思想工作比较薄弱，因此派我去当政治指导员。我不太愿意去，主要是从没有搞过儿童工作，且又没有唱歌、演戏、跳舞的专长。左洪涛同志说，他们那里已经有艺术指导员，但缺少政治指导员，派你去当政治指导员是组织决定。我只好服从。临走时，朱河康同志对我说，这是临时工作，组织关系不转去，要我以一个进步青年的面目去开展工作。

广州儿童剧团的团长叫谈星，当时组织上并没有告诉我谈星是党员，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抗战前夕，他在广州一间小学当校长。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他组织了一批小学生成立广州儿童剧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他就带领儿童剧团离开广州到英德、韶关一带开展宣传抗日救亡活动。当时，该团有20多人，现在能记得名字的有海风、叶里、杨红、金峰、夏扬、乔飞、伊宁、谭明、白桦、路琪、殷虹、丁文、徐力等人。最大的15岁，最小的才11岁。另有3个青年人当艺术指导员。

我进团后不久，剧团决定到迁江、宾阳一带前线去演出。在行军途中，杨红、叶里、伊宁、谭明等孩子主动给我介绍情况，从他们的言语中，我感到这些孩子不但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还具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但他们毕竟还是孩子，当工作告一段落时或晚上睡觉前，总有一两个女孩子因为想家而哭。但只要我给他们讲故事，讲抗战必胜的道理，他们又破涕为笑了。我们每到一个驻地都是打地铺的；男孩子们睡在我的左边，女孩子们睡在我的右边。他们都叫我郑大姐，我也就像大姐姐似的和他们工作生活在一起，我在艺术上对他们没有什么帮助，但在学习上、生活上、思想上，却耐心细致地帮助他们，因此他们愿意接

近我，和我谈。我除了给他们讲抗战故事外，还给他们上政治课，主要讲《论持久战》、《游击战》、《论新民主主义》等。

这个团没有固定的经费，靠演出维持生活，这次到前线主要是为各部队演出。舞蹈有海军舞、收割舞、儿童舞等，歌咏唱歌主要是唱抗战歌曲，还演出一些独幕话剧。孩子们从新安旅行团那里学到一些节目，自己也编写一些。演出这些节目，对宣传抗战到底，鼓舞士气起了一定的作用。国民党官兵们看到这些小孩子到前线来为他们演出时，很受感动，也增强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

孩子们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到一个部队演出，就由师部拨一点粮和钱作为招待的伙食，招待得好，吃得好些，招待得不好，连菜也没有，就用盐水送白饭。孩子们轮流值班买菜煮饭，轮到值班时，天没亮就要起床。剧团最小的叶里才 11 岁，矮胖矮胖的背着一个行军锅，行军锅的直径差不多有他高，够他受的，但他从不叫苦，和哥哥姐姐们一样，非常认真地为全团做好三餐饭。在这么艰苦的生活条件下，除经常排练和演出，孩子们还抓紧时间看书学习。

剧团在前线演出约三个月就回到柳州，战时工作队也从前线回来了。我就离开了孩子们，回到战时工作队。这时正值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国民党把许多进步的群众团体宣布解散，政治部最先提出要解散儿童剧团。谈星他们经过讨论，决定把队伍带回广东。国民党七战区的余汉谋比较反动，当儿童剧团在韶关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就下令把全团人员逮捕了。我们在柳州听到这个消息后，左洪涛、何家槐等同志曾设法通过李济深去营救，但毫无结果。

我在广州儿童剧团度过了难忘的一百多天，和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被捕后，我时常怀念着他们。1944 年秋，有一天叶里和殷虹、丁文跑到柳州窑埠街实验小学来找我。我见到

他们后高兴极了。他们告诉我，趁日寇进犯衡阳时，他们从监狱里逃跑出来了。他们又详细地给我讲了他们当时被捕的情况以及在狱中斗争的情况，我顿时感觉到在面前的叶里和殷虹已经不是孩子了，他们小小的年纪，为了挽救苦难的祖国，不怕流血牺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把他们安顿好以后就向支部作了汇报。支部决定要保护他们，并及早地帮助他们撤退到后方重庆去。我按照支部的决定一一办妥，后来叶里从重庆去了延安，殷虹进了育才学校。不久谭明、路琪也到了重庆工作。1947年我从国民党地区撤退到香港时，谭明也从重庆到了香港。她见到我时好像见到亲人一样，激动不已，并马上向我提出入党要求。我认为她经过严格的考验，已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当时我任港九妇联的支部书记，我把这情况向支部作了汇报，支部同意我介绍谭明入党。在谭明进行入党宣誓仪式时，我又情不自禁地想念着儿童剧团的其他孩子们，孩子们给我的鼓励和教育是永远难忘的。可喜的是，他们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正在不断地成长。

广州儿童剧团战斗历程

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战争中的一支小生力军，希望孩子们一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创造新中国。以“革命、救国、创造”的精神武装起来进行工作。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广州儿童剧团，正是以这种精神，冒着日寇炸弹、炮火的危险，顶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刁难迫害，忍着贫穷与疾病的侵袭，在城镇农村的群众之中，播下了抗日、民主、进步的种子，发挥了在抗日战争中的一支小生力军的作用。

广州儿童剧团是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文艺宣传队伍，自1937年9月18日建团，至1943年11月26日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集体被捕入狱为止，在广东的西江、北江一带和广西全省各地区转战整整六年。下面是我团六年奋战的简单历程。

一、在抗日烽火中诞生 (1937年9月18日至1938年11月)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我国的大规模进攻，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旗帜下，展开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具有反帝光荣传统的广州，抗日民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兴起。9月18日在市立第54小学（现梯云路小学）礼堂里，一群天真的孩子举起了小拳头，在

老师谈星（何承蔚）的领导下，组成了一支儿童抗日救亡文艺宣传队伍——广州儿童剧团。团员有 130 多人，大都是黄沙、逢源、陈塘等区的小学生，年纪最大的 14 岁，最小的只有 9 岁。团长谈星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也只有 21 岁。

剧团成立后，我们在广州市和郊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演出抗日话剧《打日本》、《仁丹胡子》、《放下你的鞭子》等，每周到广播电台播唱抗战歌曲；同广州艺协、锋社、蓝白剧团、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联合演出和义卖献金，为华北抗日军民捐募寒衣和药品。当日军持续轰炸广州、学校停课的情况下，剧团为适应战时需要，开办了平民夜校和儿童识字班，并通过来学习的小朋友回去向他们的家长、亲友和小朋友们进行抗日宣传。

1938年，“七·七”抗战周年纪念，广州市掀起了规模浩大的献金运动，支援前线。团长谈星更是日以继夜地辛勤奔波，领导我们联系各区儿童进行工作。同时，为纪念“八·一三”、“九·一八”和我团成立一周年，我们赶排了四幕六场儿童剧《古庙钟声》（许幸之作）、《海葬》，在太平戏院公演。同年 10 月中旬，全市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决心“誓死保卫大华南”、“保卫大广州”。蒋介石却推行对日节节退让的政策，促使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迫降，集中兵力南下，在大亚湾登陆，向广州推进。广州危急，广东省政府为了应急，成立了动员民众委员会，动员委员会组织战时工作大队，分赴各地城镇农村开展工作。中共党组织指示各进步团体争取参加，领取经费，随队活动，见机行事。我们团和“上海八·一三歌咏队”、“广州蓝白剧团”共同组成战时工作第五大队，准备向广西梧州方向撤退。撤退前，谈星团长召集愿随团西撤的团员去哥伦布餐厅，参加廖承志同志召集文艺界进步人士的紧急会议。他作了《当前抗日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明确了我们今后工作的方向。由于时间仓促，来得及集中的

我团同志仅有 22 人。10月 21 日，广州沦陷的当天上午，我们冒着敌机的轰炸，高唱着“中国不会亡……”的歌曲，告别了抚育我们成长的家乡——广州。从此，我们便离开了舒适的家庭、慈爱的父母，凭着一颗爱国赤诚的心，在漫长的流浪生活中，坚持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和战时儿童运动的组织工作。

我们和难民一起撤离广州。火车到三水附近，因日机轰炸，前面铁路已被敌人破坏，我们只好顶风冒雨，忍饥受寒，露宿公路、码头，徒步沿西江北撤，每天行走十几小时。某日深夜两点，大家又饥又困，一个个倒在公路旁就睡着了。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剧团仍然坚持抗日宣传。路上遇到伤兵、难民、乡亲们聚集的地方，便立即放下背包，拿起道具，敲起锣鼓，就地演出和教唱救亡歌曲。由于我们是从战区来的少年儿童，现身说法演得真切感人，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有的观众和学校师生自动协助我团工作，并表示也要组织起来，用自己的力量保家卫国。我们动员民众参加抗战行列教唱《救亡进行曲》和在军队中动员士兵枪口对外，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教唱《救国军歌》，两首歌都在学生、士兵和广大民众中传播。

我们在战火洗礼中迅速成长，很快就像大人一样能够独立料理自己的生活，还把同情和关怀送到难民和伤病员之中，尽心细致为他们服务，给他们送茶水，缝补衣服和寄家信等。遇到环境十分艰苦时，我们就高唱《少年进行曲》共勉：“少年！少年！新中国的少年，不怕苦，不怕敌人的凶残。我们在抗战中成长，一切都为了抗战”。这雄壮高昂的歌声，传遍城乡，响彻云霄。

二、转战广西各地

(1938 年 11 月至 1943 年 1 月)

在广西四年多的时间里，剧团先后到过桂东、桂西南和桂北大小城镇乡村，以及迁江、宾阳、上林、武鸣一带前线，开展各

项救亡宣传活动，同时还宣传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增强持久抗战必胜的信心。

我们战时工作政工第五大队是11月初到达广西梧州的。在梧州，我们和当地文化教育界人士联合发起“抗日救亡歌咏宣传周”，在街头、十字路口、学校、娱乐场所，设置宣讲台、点，教唱革命歌曲；刷写抗日大标语；组织漫画巡回展；并展出宣传抗战，揭露日军侵略暴行的大型图文并茂的壁报等，把普及爱国救亡宣传，搞得有声有色，家喻户晓。活动一段时间后，我们于11月底到达柳州。

在柳州，我团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12月，广东省民众动员委员会宣布停止供给经费，战工第五大队只好解散。为此，我们三个艺术团体组织了一次筹款演出，上演了《扬子江暴风雨》、《塞上风云》。演出后，他们留给我团一点钱，就先后离开柳州。从此，我团就没有固定经济收入，完全要靠“自力更生”了。大家一时陷入彷徨之中，不知小小的儿童剧团，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团长谈星及时给我们分析形势，权衡利弊，并且满怀信心地讲述了我们可以坚持下去的各种有利条件，特别强调广大少年儿童十分需要我们多方面开展宣传教育、组织工作。思想明确了，我们很快又振奋了起来。决心团结一致，努力奋斗，渡过难关。我们在柳州河南、河北两岸演出街头剧，展出流动漫画、大型墙报等，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和汉奸汪精卫卖国求荣的言行，激发群众同仇敌忾挽救民族危亡的意识。为了纪念抗战两周年，我们还参加了推销进步书籍和抗战歌曲选集，举办篮球义赛、歌咏比赛，在全市各界歌咏比赛中，我团获得了第一名。这些活动对当时当地的救亡戏剧开展和儿童活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我团应邀到广西农学院演出。我们的演出纯朴动人，感染力强，有很好的宣传效果，深深感动了学院的教授和广大师生，他们看到我们十分清贫，纷纷自动捐钱、捐衣被给我们。

这之后，我们又接到在融县的“四一”兵工厂的邀请。在我们准备离开柳州赴融县演出的当天，1939年4月16日《柳州日报》曾评说：“广州儿童团抵柳数月，工作异常努力，对于儿童救亡运动推动尤为积极，最近该团演出《古庙钟声》，招待本市儿童及各界民众团体，情形甚为热烈。……”

“四一”兵工厂的前身是广州石井兵工厂，工人们迁到广西的深山僻野之后，生活不习惯，水土不服，加上敌人、汉奸从中破坏，想尽办法企图骗工人回广州沦陷区工作，工作情绪不大稳定。看了我们这些从家乡来的孩子，充满爱国热情的演出之后，他们深深感动，纷纷到后台邀我们到宿舍去玩。工人们围着我们问寒问暖，并提出不少疑问。他们问团长：“你是个大学生，哪里不能寻个好生活，为什么挑这份担子，既没有薪水，剧团又没有政府给经费，不是自找苦吃吗？”又问我们：“你们小小年纪，背井离乡，到处流浪，图的是什么呢？”团长诚恳地回答说：“我何尝不想安安定定教我的书呀！可是不行呀，日本鬼子一连数月疯狂轰炸广州，学校都停课了，现在又占领了广州，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才带领这些学生出来，唤起民众抗日救亡。”团员海风接着说：“这都是日本鬼子迫的呀！”一位工程师拉着我的手问：“你的父母呢？想家吗？”我说：“我的父母在广州，现在不知去向，也不知死活，我很想他们，也很为他们担心。但我更恨日本鬼子，我宁愿流浪也不当亡国奴。”那位工程师说：“对！有志气！我也不回去。”经过谈心，我们和工人的心贴得更近了。针对工人的现实思想，团长赶写了剧本《爸爸不要做汉奸！》，排练演出后，收到良好效果，不少工人激动得流下了泪。当我们演出任务结束，准备离厂时，职工们再三挽留，要和我们联欢。我们答应留下后，职工们活跃了，老职工也登台演唱粤剧。他们的锣鼓、行头、布幕、道具都有一整套的。原来，在广州时，厂里的业余粤剧是经常演出的。这一次，我们和工友们同台演出，至深

夜才散。第二天，工程师领我们参观他们制造的各种武器，让我们最高兴的是，每人都打了步枪和机关枪。老师傅们还给我们每个人一架铜制的小飞机模型，希望我们长大成为捍卫祖国蓝天的战士。第三天上午，当我们离开兵工厂，已经跑了三四十里路时，几位工友挑着衣物、棉被、草帽，带着现款，追了上来，说这是全厂职工的一点心意，一定要团长收下。工友们的深情厚谊，使我们受到了鼓舞和教育。

离开融县，我们进入桂西北边远的长安、百寿。这里的群众是第一次看到宣传抗日救亡的话剧，感到新鲜、亲切，很自然的接受了我们宣传的道理。我们还帮助两地的学校，分别建立了战时儿童工作团，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活跃了当地的抗日爱国活动。

1939年6月，我们开始翻越桂北有名的高山峻岭“苦马岭”和“三大炮”，准备奔赴桂林。当我们艰难地攀上山顶时，我靠在供人歇脚的凉亭圆柱旁，回首眺望走过的大大小小山头，一种无比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谈大哥走过来问：“你看什么呢？”我指着下面的山头高兴地说：“它们都被我们征服了。”谈大哥招呼大家：“快来看一看这‘一览众山小’的难得看到的风光。”海风看着山下，也深有感慨地说：“现在更理解登山途中谈大哥一再鼓励我们，坚持就是胜利的意义了。”

19日，我们经过一周的时间，经受了“苦马岭”和“三大炮”的严峻考验，徒步600多里，终于到达了桂林东安镇小学驻地，受到了住在这里的“新安旅行团”的同志们和汪达之顾问的热烈欢迎。

在广西四年多，特别是在桂林的九个多月（1939年6月至1940年3月底）是我团重要的发展时期。当时的桂林，在中国共产党南方局、周恩来同志的亲自关怀指导下，利用广西地方势力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与蒋介石中央政府的矛盾，

使桂林的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在一定时期内，成为我党领导下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它吸引了大批从上海、武汉、广州、香港各地沦陷区和广大后方迁移来的进步文化界、戏剧界、音乐界、美术界、新闻界、出版界等知名人士，如沈钧儒、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欧阳予倩、司马文森、邵荃麟、马彦祥、焦菊隐、熊佛西、洪森、周钢鸣、范长江、金钟华等。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下，桂林的儿童抗日救亡运动也蓬勃发展，组织了一个“桂林儿童团体工作座谈会”，“座谈会”属下的各儿童团体代表，还为我团举行了欢迎会。我们也参加了桂林儿童团体工作座谈会，从此，和各地来桂和在桂林的儿童团体一起研究、交流经验、计划部署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如发动全国少年儿童给前方抗日将士写慰问信、寄慰问袋，发动少年儿童节约零用钱“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为抗日战争中死亡的少年儿童树纪念碑等。

对我团来桂后的情况，当时 1939 年 6 月 24 日《广西日报》报道说：“桂林儿童工作座谈会，昨日开会欢迎广州儿童剧团，……一群小战士欢聚一堂，甚为热烈。首由新安旅行团黄健芬主席致欢迎词后，即请广州儿童剧团谈星团长报告在广州工作情况及来桂经过，言词中充满着该团在万难中艰苦奋斗的精神，听者深为感动，最后并共同提议，由各儿童团体帮助该儿童团日常生活所需，以尽友谊。闻广州儿童剧团亦此次备受桂林各界热烈欢迎及帮助深为感激，特于今明两晚在省府大礼堂公演话剧招待各儿童团体，明晚招待各界人士以谢盛意。”又讯：“在艰苦奋斗中走遍了华南各地之广州儿童剧团，已于日前步行抵桂，备受本市儿童团体及各界热烈欢迎。该团抵桂后工作甚为紧张。前晚应广播电台之请，前往播送抗战新歌，所播之曲，计有二部及四部合唱甚多，歌声雄壮，颇得各界好评。广州儿童剧团是个民众团体，一直靠自筹经费，坚持抗日戏剧工作，而两年来没有政府经